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SHANXI WENXUE PIPING SHUXI

| 主编 / 张 平 张明旺 |

『山药蛋派』到『晋军』

傅书华◎著

Cong shanyaodanpai dao Jinjunhou

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后” 论山西作家群流变中的精神演化 山西小说兴衰论析 “山药蛋派”论析 论“山药蛋派”作家塑造典型的成型方式 论赵树理文艺创作中的三晋文化特质 梦幻中的现实 论“晋军”作家塑造典型的成型方式 沉默如金的成一 执著于生命存在的李锐 土著张石山 人性与物欲的对抗 “两结合”的《抉择》 人类的“十四岁”诗吟 《龙族》带给长篇小说的启示 论报告文学写作的困境与出路 情感与理念的倾斜 我们应该怎样面对今天 对社会底层卑微人生个体日常生存的关注 葛水平小说三题 真实（现实主义）的力量及其现实意义 神性、人性与社会性的纠结 偶谈探索性新锐散文写作 让“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四题 重在深层的清理、反思与转换 论中国当前女性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后” 论山西作家群流变中的精神演化 山西小说兴衰论析 “山药蛋派”论析 论“山药蛋派”作家塑造典型的成型方式 论赵树理文艺创作中的三晋文化特质 梦幻中的现实 论“晋军”作家塑造典型的成型方式 沉默如金的成一 执著于生命存在的李锐 土著张石山 人性与物欲的对抗 “两结合”的《抉择》 人类的“十四岁”诗吟 《龙族》带给长篇小说的启示 论报告文学写作的困境与出路 情感与理念的倾斜 我们应该怎样面对今天 葛水平小说三题 真实（现实主义）的力量及其探索性新锐散文写作 让“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四题 重在深层的清理、反思与转换 论中国当前女性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后” 论山西作家群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SHANXI WENXUE PIPING SHU XI

主编 / 张 平 张明旺

『从山蛋派到晋后军』

傅书华◎著

Cong shanyaodanpai dao Jinjunhou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后” / 傅书华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2.8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 张平, 张明旺主编)

ISBN 978-7-5378-3716-3

I. ①从… II. ①傅… III. ①小说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6074号

书 名	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后”
-----	---------------

著 者	傅书华
-----	-----

责任编辑	史晋鸿
------	-----

封面设计	阎宏睿
------	-----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	---------------

邮 编	030012
-----	--------

电 话	0351-5628696(营销部)
-----	-------------------

	0351-5628688(总编办)
--	-------------------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8200905 转 802
-----	---------------------------------

网 址	http://www.bywy.com
-----	---

E-mail	bywycbs@163.com
--------	-----------------

印刷装订	山西荣博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710×1000 1/16
-----	---------------

字 数	270千字
-----	-------

印 张	17.25
-----	-------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	------------

印 次	2012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	----------------

书 号	ISBN 978-7-5378-3716-3
-----	------------------------

定 价	28.00元
-----	--------

山西批评家实力的集中展示

——序《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张 平

山西是文学大省,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历史上出过许多成就卓著的大作家,也出过不少大评论家,比如唐代司空图,就写过文学评论经典《二十四诗品》等作品。近现代山西文学史上,同样有过一些影响很大的评论家,比如李健吾等。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我省创作的繁荣兴盛,文学评论发挥了引导和推动创作的重要作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批评家》杂志为核心,凝聚和培养出一支在全国评论界令人瞩目的评论家队伍,成为“晋军崛起”中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些评论家经过二十多年的磨砺,知识积累越来越丰富,理论素养越来越厚实,评论视野越来越广阔,写作成就越来越突出。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省作家协会决定推出这套《山西文学批评书系》,以展示我省文学评论家的实力。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入选的八位中青年评论家段崇轩、傅书华、苏春生、陈坪、杨占平、侯文宜、杜学文、王春林(以年龄长幼为序),都是当下山西文坛的骨干力量,都还在职,担负着宣传、文学、教育、科研等方面的领导或教书育人工作,并且都已经从事文学评论二三十年,出版和发表过许多专著和评论文章。这次,他们每个人都非常认真地遴选出近些年来发表的文章,结集成书,代表了他们各人的学术水平和评论风格,应当说,集中体现了山西批评家的整体成就,是山西文学界值得关注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对于进一步促进全省、乃至全国文学创作健康发展,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自己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偶尔也写点评论文字;不过,却一直重视和

关注文学评论,有不少评论家是我的老师或朋友,在我的写作过程中,都给予过难忘的帮助,这次《山西文学批评书系》中的八位评论家,多数都写过关于我创作的文章。因此,我对评论家的创造性文学劳动非常尊重。人们常说,评论和创作是文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健康的高水平的文学评论,就难以有创作的不断提升。评论家通过对作家与作品的解剖、分析、判断,通过对与作家作品相关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研究和探讨,实质上是参与到了整个文学秩序中,并构成强有力的一环。

就国内目前的文学评论状况而言,我认为,伴随着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的演变,评论也已趋向多元化。文学评论作为文学这个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变化;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方式,与社会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评论也不例外。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时代逐渐转变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价值观念、文化素养,也随之发生了遽变,文学创作所反映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同时,创作本身也越来越多样化。这样,文学评论自然不能仍旧墨守成规,在评判作品的价值时,在分析作家的艺术风格时,在研究创作倾向时,都不再像以往那样单一了。另一方面,文学评论家自身的理论基础、观察问题的角度、写作的方式等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衡量作家、作品的标准也越来越新颖、宽泛。应当说,文学评论总体上是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了。这个特点,我们从这套《山西文学批评书系》中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理想的文学批评当然是既要有“作协派批评”的生动活泼和尖锐犀利,又要有“学院派批评”的理论深度和旁征博引。但是,正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文学批评也难以达到这种理想化程度。我个人的看法是,每一种形式的批评,都有自身的优势,同时也有不同程度的局限,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优势,克服局限,切实做到有理有据,把握住所评作家或作品的核心问题,真正起到指导创作的作用,评论的价值也就体

现出来了。不管是“作协派批评”，还是“学院派批评”，或者别的什么批评，都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不过是表达方法方式不同而已。其实，这些批评方式，都有着一种互补的成分。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成败，或者一部作品的水平高低，既需要“作协派批评”的生动活泼和尖锐犀利，也需要“学院派批评”的理论深度和旁征博引，还需要别的批评从另外角度进行透视。这样，对于所评作家或作品乃至整个文学，才是有益的。

关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就我所接触的作家而言，绝大多数对批评家是友善、尊重和理解的，他们认为批评和创作是相互联系的，都是文学的组成部分，没有批评的创作是不完善的；对于批评家关于创作的看法，有些作家确实受到了启示，即使有些看法不一定符合作家的创作意愿，也能够理解，因为从评论家的角度看作品，总是与作家有一定的不同。当然，也有少数作家认为批评家是依附于作家而生存的，轻视批评家的作用，这只能说这些作家还没有真正理解了批评的意义和作用，随着他们阅历的增多，会逐渐改变这种态度的。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的面世，我觉得对于八位评论家的写作，是一个有价值的小结，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同时，对于整个山西文学评论的发展，也有诸多的启示意义。希望全省的老中青评论家都能够不断表现出各自的独立性，建立各自的风格特点，积极参与到全省和全国文学创作中，发出我们的声音，展示我们的实力，为进一步推动山西文学创作大繁荣大发展，发挥特殊作用。

2012年4月16日

（张平：山西省副省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宏观审思

1

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后”

——山西三次小说创作高潮之再审视 / 2

论山西作家群流变中的精神演化 / 20

山西小说兴衰论析 / 32

“山药蛋派”论析

37

论“山药蛋派”作家塑造典型的成型方式 / 38

论赵树理文艺创作中的三晋文化特质 / 50

梦幻中的现实

——从马烽、孙谦的三个电影文学剧本论一种创作模式 / 62

“晋军”论析

73

论“晋军”作家塑造典型的成型方式 / 74

沉默如金的成一 / 82

执著于生命存在的李锐 / 86

土著张石山 / 93

人性与物欲的对抗

——论钟道新的中短篇小说 / 98

“两结合”的《抉择》 / 107

人类的“十四岁”诗吟

——论蒋韵的小说创作 / 112

《龙族》带给长篇小说的启示 / 120

“晋军后”论析

127

论报告文学写作的困境与出路

——以张雅茜的《大医之道》为例 / 128

情感与理念的倾斜

——本土作家田澍中论 / 132

我们应该怎样面对今天

——致张行健 / 140

对社会底层卑微人生个体日常生存的关注

——读王祥夫的新世纪小说 / 149

葛水平小说三题 / 157

真实(现实主义)的力量及其现实意义

——评李骏虎长篇小说《母系氏家》 / 167

神性、人性与社会性的纠结

——评青年女作家小岸近期小说创作 / 175

偶谈探索性新锐散文写作

——从玄武散文说开去 / 185

让“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四题 / 190



学苑掠影

201

重在深层的清理、反思与转换

——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若干思考 / 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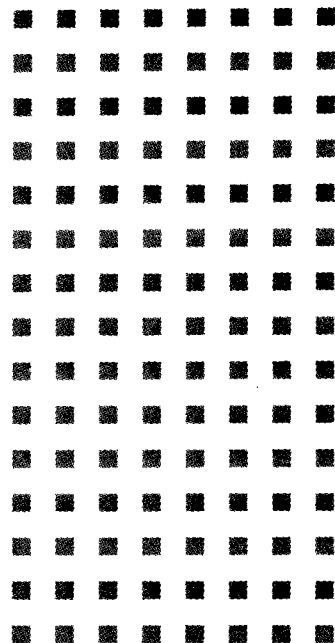
论中国当前女性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 221

心灵的迷狂

——张承志现象批判 / 234

后 记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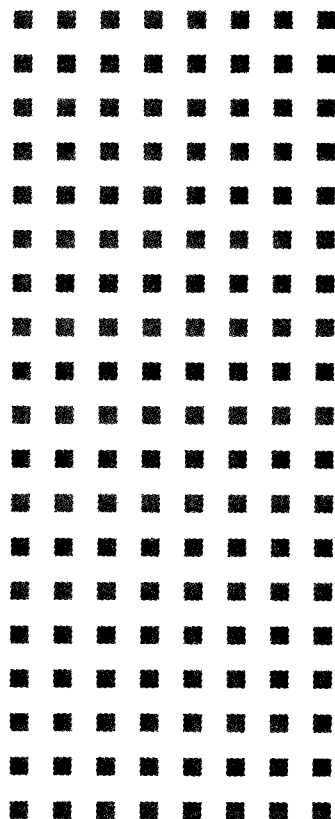


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后”

CONGSHANYAODANPAIDAOJINJUNHOU



宏观审思



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后”

——山西三次小说创作高潮之再审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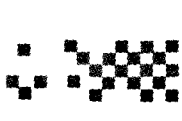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在六十余年来的中国小说创作中,山西的小说创作,曾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成一、李锐等人代表的“晋军”群体,以张平为代表的“晋军后”创作,三次规模不等、程度不同地影响过中国文坛。这三次影响,“山药蛋派”的小说创作,因其时间的沉淀,已经成为具有“史性”意义的话题,“晋军”及“晋军后”的小说创作,则现实意义更为突出。但无论其“史性”意义还是其现实意义,二者之间却又是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的。山西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够如此,有着其内部与外部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所在,值得我们花大力气给以一次次地认真地探讨,本文的写作,就是基于此的一次努力。

一

在上述山西小说创作对中国文坛的三次重要影响中,“山药蛋派”的小说创作无疑是其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一次。

让我们先从根据地文学说起。

根据地文学形态相对于国统区、沦陷区文学形态而言,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学形态,并直接影响、开启了其后的共和国文学。宽泛地说,根据地文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形态,自井冈山红色苏区始,至建国之日终。姑且先不说红色苏区的文学尚不成熟,既以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的文学而言,尽管其时比较著名的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多达十几个,但不论哪一个根据地或解放区,从真正体现了根据地文学形态、创作实绩方面给以考察,都无法与以“山药蛋派”小说创作为主体的



山西根据地文学来一争高下。

不错,陕甘宁边区是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根据地文学的中心,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价值的,却是在文艺思想的冲突方面,在五四文学谱系进入根据地之后的演化方面,如对王实味、萧军等人的批判,如丁玲文艺思想的转变,如《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的出现等等。当然,贺敬之等人的《白毛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的《种谷记》、欧阳山的《高干大》等确实是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文学的丰硕成果,且这些人的创作,在建国后,在根据地文学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一脉相承上,也仍然属于体现实力、实绩的代表性作家,特别是柳青,他的那部《创业史》,堪称是根据地文学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一脉相承下来的集大成者,但在根据地时期,上述这些丰硕成果,毕竟是归属在赵树理的“方向”“旗帜”之下的。

不错,孙犁等人的创作,确实体现了冀中区根据地文学的成就,但在创作队伍的阵容方面,那还是不能与山西根据地其时已经成形的“山药蛋派”的创作队伍相比的,且孙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中期,即已经基本上停止了自己的创作,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的文学创作,在新中国的文学格局中,其分量也是不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的,就是说,在体现根据地文学对新中国文学的影响上,冀中区的根据地文学是不能与山西根据地文学相比肩的。

不错,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确实是根据地文学的代表性成果,但前者已经不好说是单单归属于哪一个根据地了,后者即使归之于东北解放区,但无论从根据地文学创作历史的长短上,还是从根据地文学创作的整体实绩上考量,东北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是远远不及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文学创作的。

如果上述的描述尚能成立的话,那么,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那么多的根据地、解放区中,在体现根据地文学形态、创作实绩方面,为什么单单山西革命根据地能够首屈一指,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名列前茅呢?是根据地文化与山西地域文化的亲和性使之然?是革命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亲和性使之然?抑或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再让我们从文艺思潮、文艺运动的角度给以考察。

根据地文学形态及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形态,集中地体现于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中。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上承五四、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以毛泽东的《讲话》为理论旗帜,以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为创作旗帜,正式地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初。以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为代表,兴盛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以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曲波的《林海雪原》为代表的革命传奇小说和以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为代表的短篇小说等为标志,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达到极盛。这之后,则以浩然的《艳阳天》、陈登科的《风雷》等为代表,在1963年后,进入停滞期,而在“文革”中,最终消亡。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这一发展、演化轨迹,与“山药蛋派”的发展演化轨迹,可以说,是完全同质同形同步的,或者说,“山药蛋派”以其自身的发展演化轨迹,从始至终地体现、构成了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发展、演化轨迹。“山药蛋派”的第一代作家是赵树理,其早期创作始于1928年,上承五四、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而于《灵泉洞》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至40年代初,作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①,以自己的成熟的小说创作如《小二黑结婚》等,与“山药蛋派”的第二代作家,直接汲取根据地思想资源成长起来的晋绥五作家马烽、孙谦、西戎、胡正、李束为最初的小说创作,如《吕梁英雄传》等一道,共同在实际创作上,标志着“山药蛋派”的形成。“山药蛋派”的兴盛期大致在建国初至1957年,这一时期,赵树理的创作高潮一直延续到1955年的《三里湾》,以马烽为代表的晋绥五作家的创作在这一时期则基本上形成了自己成熟的创作风格。以1958年晋绥五作家全部调回山西工作并相继担任山西文艺界的高级领导职务,《文艺报》推出《山西文艺特辑》,山西文联的《火花》杂志集中体现“山药蛋派”的文艺思想,马烽等晋绥五作家的创作达到高峰以及韩文洲、义夫等“山药蛋派”第三代作家的加盟为标志,至1962年“大连会议”对赵树理及作为“山药蛋派”人物塑造特色的“中间人物论”的高度肯定,“山药蛋派”小说创作达于极盛、高潮期。这之后,随着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山药蛋派”的小说创作进入停滞期,而终于在“文革”中最终消亡。

^①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7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还需要加以补充的是,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期、兴盛期,是以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上承五四、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为代表的作家的创作成果作为其成就体现的,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第二个高潮期、极盛期,是以柳青、梁斌、马烽等直接汲取根据地思想资源的作家的创作成果作为其成就体现的。“山药蛋派”小说创作的演化轨迹也是如此。赵树理小说创作的高潮至1955年的《三里湾》基本上宣告结束,其后则步入了少产且创作追求陷入困窘的停滞期。“山药蛋派”的极盛期,是以马烽等晋绥五作家及韩文洲等“山药蛋派”第三代作家的加盟作为其实力阵容体现的。

“山药蛋派”小说创作的演化轨迹之所以与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演化轨迹完全一致,是因为“山药蛋派”的审美观、审美形态与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审美观、审美形态完全一致,且其自身内在矛盾及自身与外在世界、历史运行之间的矛盾形态、性质也完全相同,如农村题材、对现实的关注、理想化结局、大众化写法等等,对这一审美观、审美形态,对这一内在与外在的矛盾形态、性质,许多论者已经多有阐释,我在这里不拟展开论述,我只想从“山药蛋派”之所以会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中,产生重大影响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谈以下三点:

第一,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在革命根据地之外,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贫富之间极端的悬殊与对立,垄断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尖锐矛盾,权力机关的腐败堕落等等,都使广大民众将希望的目光与前行的脚步,投向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众多有志之士有志青年潮水般地涌入根据地、解放区,根据地、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并最终建立新中国,就是最好的历史的证明。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根据地及其后的新中国的十七年,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病的有力制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螺旋上升的一个必然阶段。工农兵文学思潮、流派,是这一全新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情感形态的形象反映。因之,较之国统区、沦陷区的文学,自有其在历史上领潮流之先的位置与意义,“山药蛋派”则又站在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潮头,因而,其位置与意义的重要,自然一目了然。稍稍多说一句的是,在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的今天,至少在文学界,如何汲取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价值资源,批判现代化形态中的种种弊病,是一个亟待研究的也是一个极具现实性的课题,所以,“山药蛋派”

不仅具有“史性”意义,也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第二,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最主要的质素、品格、特征,在“山药蛋派”身上有着最为集中、纯正的体现。因之,“山药蛋派”作家与丁玲、周立波、艾青等从上海现代都市进入根据地的革命作家不同,丁玲等人所经历过的现代都市文化与根据地文化的矛盾、冲突、磨合是“山药蛋派”作家所没有的。“山药蛋派”作家与在新的共和国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如王蒙、高晓声、陆文夫、刘绍棠等人也不同,王蒙等人在生命成长期的青春性与共和国在成长期的青春性的同步形态以及王蒙等人对新的社会矛盾的敏锐感受是“山药蛋派”作家所不能充分体现的,所以,“山药蛋派”作家也较少遭受王蒙等人的“右派”厄运。“山药蛋派”作家的这一命运形态,有助于他们与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共始终。

第三,在根据地时期,“山药蛋派”的主要作家赵树理及马烽等晋绥五作家,分属太行边区与晋绥边区,他们虽然与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气脉相通,实为一体,马烽等晋绥五作家还在延安学习过,但他们毕竟不在根据地的权力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这就使得他们不会直接受到根据地权力中心的政治风雨激荡的冲击,有着相对稳定的创作空间。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虽然赵树理、马烽特别是赵树理,曾经长期生活在北京,但其主要创作活动却是在山西,这与他们在根据地时期的创作空间有着某种类似之处,即都是在创作内容上,与政治文化中心高度一致,但在创作空间上,却又与政治权力中心有着一定的距离。这样的一种创作时空及创作主题上的创作状态,就使得“山药蛋派”作家既能不身处政治文化中心,但其创作却能进入政治文化中心,甚至还能领时代文化的潮头。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的关系,主要是赵树理与以马烽为代表的晋绥五作家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的一个关注焦点,早如新时期之初,刚刚公开对“山药蛋派”给以正式命名、张扬之时,戴光宗就从描写重点(赵树理重在写人物,马烽等人主张写新人新风尚)和对待传统的态度(赵树理强调继承传统,马烽等人则不同)两个方面,论述了赵树理与马烽等人没有共同的理论主张,因而认为“山药蛋派”并不存在^①。近期则如张恒认为“事实上,却很难说赵树理与‘山药蛋派’有什么实质上的瓜葛”,“只是到了80年代初,某些‘山药蛋派’理论家为了证明‘山药蛋派’的显

①戴光宗《“山药蛋派”质疑》,山西文学1982年第8期。

赫,才把这位含冤屈死于自己故乡的作家生拉硬扯了进来。‘文革’前,在‘山药蛋派’作家中,有所谓西、李、马、胡、孙一说……这时是没有赵树理的”,“将赵树理强行裹挟进‘山药蛋派’这个日落西山的地方作家队伍,乃是对这位文学大师的最大贬低”^①。虽然学界大多数论者是将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盟主的,但在具体论述中,却也是将赵树理与马烽等人作分开论述的,如席扬,虽然那么肯定地将赵树理归入“山药蛋派”的“旗手”位置,但在对“山药蛋派”的具体论述中,又常常将赵树理排除在外,如在《“山药蛋派”艺术选择是非论》一文中,是“把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中一个独立的特殊存在,本文以后的论述除个别地方外,一般不再包括他”^②。之所以如此的深层原因,我以为是涉及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如此发展嬗变的诸多重大因素,是一个很值得深究的问题,在这里,我只能极简略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赵树理与以马烽为代表的晋绥五作家之间,是有着许多不同与相同之处的,譬如:赵树理是以农民为本位,是站在“存在”的层面来写农民的“生存形态”的,马烽等人也是以农民为本位,却是站在时代社会的层面来写农民的“生存形态”的;赵树理作品中,对作品内容的理想化处理,其理想是一种民间理想,马烽等人对作品内容的理想化处理,其理想则是一种社会理想;同样作为农民的儿子,赵树理是以本土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马烽等人是以农村干部的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赵树理的精神资源是五四理性与民间情感的融合,马烽等人的精神资源则是经过根据地文化选择过的五四理性与民间情感的融合,如此等等,尚有许多,不一而足。但上述种种各自相对的两个方面,却又是相互渗透、交叉、重合甚至是相互融合的,在上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前期尤为如此。但相互渗透、交叉、重合甚至融合,并不等于二者相同,二者之间在相似而不相同之中所形成的艺术成就中的巨大的落差,正是众多论者对于赵树理与马烽等人关系的困惑之所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上述种种各自相对的两个方面,越益分离。如是,马烽等人的文学创作之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也就伴随着这种互渗性、重合性、融合性及其后的越益分离的流变轨迹,而从“形神相似”越益趋向于“形似神不

① 张恒《一道消失的风景——“山药蛋派”文学的回眸与审视》,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② 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似”，至于“山药蛋派”的第三代作家，则从其一起步，相较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就只是徒具其“形”而无其“神”了。需要稍稍多说一句的是，“荷花淀派”前三代作家创作的演化轨迹基本上也是如此。如是，这样的一种演化轨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嬗变历程中，就是颇有代表意义的了。

其次，“山药蛋派”是在接受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诚如席扬所详细考证的，“山药蛋派”的命名有着一个十分长期的曲折的过程，虽然这一流派的主要作家的创作，在上世纪40年代即已成果颇丰，但直到1958年《文艺报》12月号，推出《山西文艺特辑》，才标志着“新中国文学界第一次把他们有意识地作为群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被称之为“山西派”“火花派”“赵树理派”，“山药蛋派”这一称谓则早在这些称谓之前，作为一个“含有明显贬义”的称谓，在人们口头私下流传着，直到1979年才由李国涛先生“正式把‘山药蛋派’从口头上移入文章并以概念的形式提出来”，且用“山药蛋派”这一称谓从特质上来概括该派，较之用“山西派”“火花派”从地域上、杂志名称上概括该派，更为准确、深刻。因之，我同意席扬所说：“‘山药蛋派’‘流派’意识并不是产生在创作主体那里，而是接受者感受的结果。”正因此，“这种命名的曲折过程也容纳着丰富的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的风云变幻和审美观念上的深刻歧见”。就是说，“山药蛋派”的种种“派性”，是在一个充满着丰富的历史内涵的接受过程中，被提取、抽象、概括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如席扬所说：“时代的‘语境’因素和权力话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受众对赵树理的理解向度和消化深度”^①，如是，丰富的赵树理就在接受的过程中，被接受者从某一向度上，给以深化与扩充，然后，以“接受中的赵树理”，进入了“山药蛋派”的版图。

也正是从时代接受的角度，我们也才可以说明，为什么尽管马烽创作的高潮期及其代表作，如《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等，无论从对人物的揭示还是从作品思想的深刻，虽然均不及他早期的作品，如《村仇》《金宝娘》，但我们也仍然要以前者来标志马烽在创作上的成就。我们也才可以说明，为什么无论从对人物的揭示还是从作品思想的深刻，马烽的小说虽然不及孙谦的小说，譬如，孙谦的《爷爷·儿子·孙子》的艺术高度，就是马烽所达不到的，但我们也仍然要以马烽作

^① 以上所引席扬之论述，参见《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20世纪“山药蛋派”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的第一节。